

在台儿庄大运河岸边的禹王山,海拔仅有125米,可就是在这座小山包上,79年前的春天,中国军队在此阻击日军进攻达27天之久,为武汉会战部署兵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场大拼杀中,有来自“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的12名女兵志愿者活跃在前沿阵地和战地医院,为战士们表演文艺节目、缝补衣服、抢救伤员,有的还拿起武器上前线打鬼子。

没有脱去旗袍的战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云南省政府将滇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出滇抗战。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夫人、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顾映秋的支持下,昆明的60名女中学生组成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笔者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云南日报》时,发现那段时间《云南日报》的“南风”文学副刊上刊登了很多歌颂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散文、诗歌,其中一首写道:“去吧,英勇的姑娘,别了那年老的爹娘,别了那美丽的家乡,抑住吧,那离别的悲伤……”

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从昆明出发。第二天《云南日报》的一篇新闻特写中报道了一个临时要求上前线的女学生,报道中说:“当场激发了一个女学生要随团而去,‘我也要,我也要随你们去,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我一定要同你们一起去!’”斩钉截铁的声音,坚决勇敢的神情,团员们没有理由拒绝她,六十个草绿色的战士当中,增加了一个没有脱去旗袍的战友。她的名字叫姜迪芳,是最近来省城求学的弥勒人,年纪二十来岁。”

奔赴台儿庄前线

1938年4月中下旬,60余万中国军队集结在鲁南,准备与日军决战。六十军接到增援命令后,于4月22日赶至台儿庄以东的陈瓦房、邢家楼一带,与日军遭遇并展开血战。

六十军将士在台儿庄浴血奋战,不断传来的将士伤亡消息令正在武汉集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姑娘们心急如焚,坐卧不安,她们纷纷请战,但是没有得到批准。在一天深夜,宋志飞带头,刘佩兰、刘先德、彭明绪、张丽芬、陈琼芬、孟昭文、黄自仙、姜笛芳、苏志贤、汤炳贤、马少良12名姑娘偷偷从武汉爬上去徐州的火车来到了台儿庄前线,在车辐山车站下车后,步行来到位于大运河岸边的黄家楼六十军军部。见到军长卢汉后,整齐地向卢汉打了个敬礼,要求分配工作。卢汉说道:“谁让你们来的?”宋志飞回答道:“我们自愿来的,花木兰、穆桂英都能上前线,我们也能杀鬼子。”卢汉说:“你们这些小姑娘要上前线打鬼子,很好。马上去军医处报道,做好抢救伤员、转运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部分团员在台儿庄前线

【故地往事】

台儿庄战役中的“娘子军”

□郑学富

伤员到后方医院的工作。”12位姑娘立正敬礼,高声喊道:“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下午,她们来到离前线约10里地的车辐山军医处报道。此时,六十军正在陈瓦房、五圣堂、邢家楼一带与敌人激战,运下来的伤员很多。可是这个村子仅有几户人家,人已经跑光,房子少,安排不了多少伤员。她们就把打谷场、牛棚等能住人的地方打扫干净,铺上晒干的稻草;伤员来了赶紧包扎伤口、换药,尽快地把他们抬送上火车,转运到后方医院治疗。她们昼夜抢救伤员、运送伤员,顾不上休息,眼睛都熬红了,可是没有一个叫苦的。

禹王山上慰问勇士

位于台儿庄东南5公里的禹王山海拔125米,是台儿庄周边唯一的制高点。从4月下旬开始,六十军184师师长张冲在禹王山打下一条坚固防线,有一个加强连坚守在禹王山顶,与日军反复肉搏争夺。

12位姑娘就合计:战士们在阵地上流血牺牲,我们也不能在后边呆着,我们到前线去慰问,为我们的勇士们鼓劲加油。

5月初的一天,姑娘们准备好慰问品,打理好行装,向禹王山前线进发。她们到禹王山附近的麦地时,从山北面的日军阵地李圩子村一阵枪弹打来,姑娘们忙趴在麦地里隐蔽。宋志飞说:“就是再危险,就算连命都搭上,我们也要把慰问品送到战士们的手中。”她们解下腿上的绑带,把慰问品绑好,背在身上,匍匐前进,爬到运河边,过

了浮桥,来到了山南麓的张冲师长的指挥所。张冲说:“前边危险,姑娘们快回去!”她们回答道:“弟兄们不怕死,我们也不怕!”张冲简要地向她们介绍了禹王山战斗经过,叮嘱她们注意安全,把她们送出指挥所。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12个姑娘3人一组,分成4个小组,继续向山顶进发。她们来到半山腰的团指挥所,1086团团团长杨洪元热情地一一和她们握手说:“姑娘们辛苦啦。在战场上牺牲是光荣的,我们决心与禹王山共存亡。”她们走出掩体,爬过弯弯曲曲的交通壕,来到了前沿阵地。战士们正持枪密切注视前方,严阵以待。姑娘们走到他们中间,把慰问品送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在异地他乡,见到家乡人民亲手制作的云南大头菜、饼干,异常兴奋,纷纷表示誓与鬼子拼到底!姑娘们还给战士们唱起了《六十军军歌》和家乡的戏曲小调。

黄昏时分,日军的炮击又开始了,连长李佐对她们说:“鬼子要开始进攻了,姑娘们快下去吧。”姑娘们齐声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战斗!”说着姑娘们趴在战壕里,跟在战士身边学扔手榴弹。炮击过后,日军开始冲锋。我军奋勇还击,顿时,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激战半个小时,日军在阵地前留下一片尸体,龟缩回去。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姑娘们与战士们依依告别,趁着黑夜返回驻地。

5月16日午后,六十军接到撤离禹王山的命令。12名姑娘们也随同部队撤离台儿庄,向武汉转移,又奔赴新的抗日战场。

【消失的古县】

风雨沧桑忆寿张

□张永红

出阳谷县城,沿333省道往东南方向十余公里,就到了金堤河北岸的寿张镇。由此继续向南约30公里,黄河南岸的梁山县北部,也有一个寿张集镇。两个相距不算太远的地方,为什么有一个差不多相同的名字?原来这一切都与一个已经消失的千年古县——寿张县有关,它们都曾经是寿张县城所在地。岁月沧桑,流年似水。如今,除了金堤下面的一座仿古石牌坊以外,昔日烟云难觅痕迹。而两个乡镇的名字,也成为这个千年古县为数不多的遗存。

寿张县因古典名著《水浒传》而广为人知。书中第七十四回说的是,燕青和李逵去打擂攀天柱,返回途中李逵走散,来到寿张县衙,装做县官判案,放了打人的人,铐了被打的人。又去学堂吓跑教师,吓哭学生。书中写道:“却说李逵手持双斧,来到寿张县……原来这寿张县贴着梁山泊最近,若听得‘黑旋风’李逵五个字,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今日亲身来到,如何不怕……”在刻画出一个鲁莽率直“黑旋风”形象的同时,也让人记住了寿张县的名字。

说起寿张县,其历史悠久,屡迁屡徙,数度分合,可谓一波三折,历尽风雨沧桑。根据《寿张县志》记载,寿张“春秋为良邑,战国为刚亭”。春秋时期的良邑属鲁国,战国时期的刚亭和寿邑属齐国,治所均在今东平县新湖乡霍庄一带。秦朝起实行郡县制,寿邑改为张县,这是寿张建县之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时改为寿良县。东汉时,为避光武帝之叔刘良名讳,改为寿张县。这是寿张县名出现之始。

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后,在东平湖一带设置兖州和济州,二州又都设有东平府和寿张县。其中,兖州寿张县治所沿秦汉制,济州寿张县治所设在今梁山县寿张集镇。北齐时期,兖州寿张县并入须昌县,结束了两县并存的局面。寿张集镇作为县治持续了900多年,一直到金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黄河决口,县城被毁,县治被迫迁往竹口镇(今阳谷县李台镇祝口村),12年后才迁回原址。李逵大闹寿张县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黄河再次决口,寿张县城毁于水患。次年,寿张县治被迫迁往黄河北岸的王陵店,即今寿张镇所在地。直到1964年的583年间,这里一直是寿张县治所在地。此后的数百年,寿张先属东平府,后属兖州府,民国时期属山东省东临道。新中国成立后,先属平原省聊城专区,后属山东省聊城专区。1958年12月至1961年7月,阳谷县曾被撤销,并入寿张县,这也是寿张辖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时期。

寿张县最近一次广为人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时期。1958年6月,寿张县台前农业社放出了小麦亩产3175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当年8月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发表专文,介绍寿张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经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省内外前来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一年内来访者约有一万多人,各地纷纷开展“学寿张,赶寿张,学台前,赶台前”的赶超运动。7月中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也亲往考察;8月初,省委在寿张召开现场会,树立其为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专标兵”。一时间,寿张成为大跃进的典型,名噪一时,闻名全国。

为解决鲁豫金堤河流域水利纠纷,国务院决定调整两省边界,将金堤以南地区划归河南省,金堤以北地区划归山东省。由于寿张县辖区地跨金堤河两岸,1964年11月,国务院决定撤销寿张县建制,将其金堤河以北地区划归阳谷县,金堤河以南地区划归河南省范县(今属台前县)。千年古县寿张的历史到此戛然而止。

历史上,寿张县的辖区范围包括今河南省台前县全境,我省阳谷县南部,梁山县西部和北部,东平县西部等区域。因此,以上县份的历史沿革,追根溯源,其源头均在寿张县。1978年,析范县东部7个公社成立台前县。台前提在介绍其历史沿革时,开头第一句就是“台前境原属山东省寿张县,历史悠久”,可见寿张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

【老照片】

50多年前的计生展

□郑世兴

1964年春节,淄博博山区计划生育展览会于大年初六正式开放,展览会设在淄博市工人文化宫展览大厅。这张照片是在开展当天拍的,工作人员是从各医院抽调来的医生和护士,我(左二)当时是展览会的负责人。

展览分四部分,一是前言与当时的计生方针,二是晚婚,三、四部分是主要板块,为生育知识和节育技术,图文并茂。那时计划生育是“新生事物”,人们对这方面知识匮乏,育龄妇女对此也是羞于出口。然而,经过宣传发动,参观者却与日俱增。致使三个讲解员难以应付,我不得不连夜背词,操着一口章丘普通话充当讲解员。待到春暖花开之后,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只要有一个人我们也不下班,有时工作到晚上九点。

在此基础上,次年,博山区组建了一支28人的计划生育工作队。时任区卫生科科长宋立云负总责,我任工作队队长,杜玉仲任副队长。先后到八陡、源泉、岳庄、桃花泉等公社开展工作。那时对计划生育是提倡,并非后来的“推行”、“实行”,更未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按当时“一个孩子太少,两个正好,三个犯错误”的提法开展工作。重点是三孩以上的育龄夫妇。我们除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宣讲,还利用广播站进行宣传外,就是挨家挨户上门动员。队员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岳庄公社正值春旱,凌晨两点公社书记王福勇就喊大家一起挑水上山,为小麦浇返青水。几天下来,肩膀肿了,甚至磨出了血,包上纱布,继续挑。没有一个叫苦的。

如今,我们在一起工作的展览会同事和工作队员,都已年逾古稀,有的已经作古。然而,当年的这段社会实践与磨炼,却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笔财富。

